

青花凝雅韵 三友傲寒枝

一品元代青花松竹梅纹梅瓶

□ 聂难

在元代青花瓷器的发展历程中，文人题材与制瓷工艺的碰撞，孕育出独具一格的艺术珍品。1976年江西波阳县元墓出土的青花松竹梅纹梅瓶，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高17厘米、口径5.7厘米、底径5.8厘米，以精巧体量承载深厚文化内涵。这件器物摒弃元代青花常见的华丽繁复，以清雅青花绘“岁寒三友”，将文人画的笔墨意趣融入瓷绘艺术，成为元代文人审美渗透民间工艺的典型例证。解读它的工艺匠心、纹饰意蕴与时代价值，便能触摸到元代多元文化交融下瓷器艺术的别样风骨。

器型与工艺的精妙契合，构筑了这件梅瓶的美学基底。作为传统瓷艺的经典器型，元代梅瓶“口小颈短，肩部圆弧，身高姿秀”的特征在此器上尽显无遗。口沿内敛小巧，颈部挺拔短促，肩部圆润过渡，腹部修长舒展，底部厚重平稳，比例协调匀称，线条流畅自然，既兼顾了储酒、陈设的实用功能，又彰显出典雅庄重的审美格调。尤为关键的是，修长的腹部为“岁寒三友”纹饰提供了开阔的创作空间，让画师得以从容布局，展现笔墨意趣。

而青花工艺的娴熟运用，则让文人意境得以精准呈现。元代青花虽以“苏麻离青”的浓艳著称，但这件梅瓶的青料经巧妙调配，呈现出独特的灰蓝色调，淡雅温润如宣纸上的淡墨晕染。青料施色精准，晕散效果自然柔和，让纹饰边缘自带朦胧诗意，与松竹梅的清雅气质完美契合。这种色彩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工匠为适配文人题材主动调整的结果，既保留了青花的通透灵动，又增添了古朴雅致之感，尽显元代工匠对工艺与题材适配性的深刻理解。

纹饰创作的文人化革新，是此瓶最核心的艺术价值所在。腹部的“岁寒三友”图摒弃繁复辅纹，以纯粹植物题材构景，内分三组，构图丰满却疏密有致，尽显文人画“以少



胜多”的艺术追求。画面中，松树苍劲参天，树干粗壮，树皮以鱼鳞皴法细致刻画，线条交错纵横，还原出松树的坚韧质感；松针细密攒集，排列有序，笔触灵动细腻。竹干一笔勾勒而成，线条遒劲有力，挺拔中透着灵动；竹叶以四五叶为一丛，叠压交错，寥寥数笔便勾勒出竹子的勃勃生机。

最具辨识度的是梅花的绘制，明显借鉴元代画家王冕的圈花法，以青料精准勾勒花瓣轮廓，层次分明；再以浓料点蕊，点睛之笔让梅花鲜活灵动，傲然枝干尽显傲雪凌霜之风骨。这种将文人画技法融入瓷绘的创作方式，打破了此前瓷器纹饰多以民间题材为主的传统，让瓷器成为文人审美表达的新载体。松竹梅“岁寒三友”的意象，本就是传统文人高洁品格的精神象征，绘于梅瓶之上，更寄寓着元代文人在社会变迁中坚守本心、追求清雅的精神诉求。

这件梅瓶的独特价值，更在于其承载的时代文化内涵与历史研究意义。元代作为大一统王朝，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文人阶层虽受冲击，但审美追求并未消亡，反而通过与工艺的融合获得新的表达形式。此瓶将文人画与青花工艺结合，正是这种文化融合的生动见证，反映出当时社会对清雅品格的普遍推崇。

同时，明确的出土背景与纪年信息，使其成为元代青花断代研究的重要实物依据。它的发现，打破了元代青花“重器皆华丽”的认知，证明当时已有契合文人审美的清雅之作，丰富了元代青花的品类与风格认知。历经数百年岁月，此瓶依旧保存完好，灰蓝青花更显古朴，纹饰线条依旧清晰。它以瓷为媒，串联起元代文人的审美情怀与工匠的精湛技艺，成为跨越时空的艺术瑰宝，让今日的我们仍能真切感受元代瓷器艺术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友谊与勇气绘就的文明交流画卷

□ 言者

在2026年元旦的银幕上，动画影片《熊猫闯非洲》以独特的视角和温暖的情感，为观众带来了一份别致的新年礼物。这部由张素娟编剧并执导的作品，巧妙地将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熊猫置于广袤而充满生机的非洲大陆，通过一段寻找友谊、认知世界、展现智慧的冒险旅程，构建起一场生动活泼的文化对话。影片不仅是一次地理空间的跨越，更是一次文明互鉴的艺术实践，以其童真烂漫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充满勇气与友爱的多彩画卷。

影片叙事的核心动力源于熊猫“明明”（在部分宣传材料中称“小胖”）对好友“玉龙”的执着寻找。这一设定本身富含深意，寻找作为人类永恒的主题，象征着对未知的好奇、对情感的坚守以及对自我价值的求证。当明明告别熟悉的家乡，毅然踏上遥远的非洲之旅时，这一步便彰显了可贵的冒险精神。而“玉龙”这一名字，既是中国文化中吉祥与力量的象征，也暗示了此次寻找之旅的内在意义不仅是找回一位朋友，更是追寻一种跨越山海的美好联结。

在冒险的进程中，明明并非依靠蛮力，而是凭借智慧化解沿途遇到的种种挑战。这一角色塑造打破了传统叙事中可能存在的刻板印象，强调了智慧作为解决问题关键的重要性。影片通过这一设定向青少年观众传递了积极的价值观：面对未知与困难，冷静的头脑、善良的初心和创造性的思维比任何力量都更为强大。明明在非洲“纵横驰骋”的过程，正是其个人成长与智慧彰显的过程，这使得角色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也使得影片的立意超越了简单的冒险故事，上升到对儿童品格塑造的引导层面。

影片将中国元素与非洲风情进行了有机融合。熊猫作为中国的“国宝”，其形象憨态可掬，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而非洲大陆则以其壮丽的自然景观、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和独特的文化传统闻名于世。这种结合创造出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艺术空间，不仅丰富了影片的视觉表现力，更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欣赏，体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交流理念。

《熊猫闯非洲》通过一个生动的童话故事，巧妙地呼应了现实世界中，中国与非洲各国人民之间历久弥坚的深厚友谊。影片制作方在卖点分析中明确指出，故事“体现中国与非洲朋友的深厚友谊”，具有“国际传播优势”。这一主题不是通过生硬的说教，而是通过明明结交新朋友等情节自然呈现，向年轻一代传递了开放、包容、友善的国际交往观。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培养孩子们具备跨文化理解的胸怀和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而这部电影以其轻松愉快的方式，在孩子心中播下了友谊与理解的种子。

影片注重色彩的明快、画面的精美和音乐的感染力，以符合儿童审美习惯的方式构建整个故事世界。其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既有冒险带来的紧张刺激，更有友情带来的温暖感动。通过明明的视角，影片将非洲大陆描绘成一个充满神奇与友好的地方，这有助于激发小观众对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熊猫闯非洲》告诉我们，无论来自何方，只要心怀真诚与勇气，就能跨越任何障碍，结交真挚的朋友，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茶话品书

一路山水一路诗

□ 倪涛

窗外雪花如絮，将尘世的喧嚣轻轻隔绝。这样的时节，最宜捧一卷书，与古人对话。我寻得曹远超先生的《孟浩然传：梦归田园》，在簌簌雪声中，循着文字的脉络，追随着孟浩然的足迹，两度踏入烟雨朦胧的吴越之地，沉浸式感受他“一路山水，一路诗”的赤子情怀。

第一次吴越之游，孟浩然正值青年，怀揣着对天地的好奇与对理想的憧憬，携一腔意气风发。彼时的他，眼中的吴越，是“江旷春潮白，山长晓岫青”的开阔明朗。传记中写道，他沿江而行，见江水浩渺，春潮涌动，与天际相接成一片莹白；远眺群山连绵，晨雾缭绕中，峰峦染上淡淡的青黛。这般景致，恰如他笔下“八月湖水水平，涵虚混太清”的壮阔意境，无需刻意雕琢，便成千古佳句。他乘舟泛于镜湖之上，看“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雄浑气象在吴越的温婉中多了几分灵动，于是挥毫写下“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将江河湖海的万千气象尽收笔端。这一路，山水是他的知己，他用诗歌为山川立传，每一步跋涉，都化作一句浅吟低唱，每一次凝望，都凝练成一曲千古绝唱。

若说第一次吴越之行是青年意气的挥洒，那第二次重游，则多了几分历经世事沧桑后的淡然与从容。此时的孟浩然，历经科举落第的坎坷与失意，再次踏入吴越，心中少了几分功利，多了几分对山水本真的眷恋。他寻访故地，见“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田园景致，心中郁结豁然开朗。传记中细致刻画了他在吴越乡间的游历场景：清晨，他踏着朝露而行，闻“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清寂；午后，他静坐溪边，看“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的雅致；黄昏，他漫步村头，赏“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的悠闲。他在吴越的山水中安放自己的失意，也在山水中汲取创作的灵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那江上的烟波，是他客居他乡的淡淡愁绪；“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那水中的月影，是他孤独心境的温柔慰藉。但这份愁绪从未将他淹没，反而在山水的滋养下，化作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豁达。曹远超先生在传记中写道，孟浩然第二次游吴越时，诗作的意境越发醇厚，少了青年时的锋芒，多了中年后的温润，每一首诗都像是从山水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与吴越的烟雨、草木、江河融为一体。

合上书卷，窗外的雪依旧在下，天地间一片洁白。我的思绪却仍停留在孟浩然的吴越之游中，久久无法平息。曹远超先生的《孟浩然传：梦归田园》，不仅让我读懂了孟浩然的生平，更让我读懂了他的诗心。他的一生，或许未能在仕途上有所建树，却在山水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两次吴越之行，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写，山水滋养了他的诗歌，诗歌又赋予了山水灵魂。他不刻意追求什么，只是随性而行，将眼中的景致、心中的感悟化作诗句，这便是“一路山水，一路诗”的真谛。

在这个冬日雪天，读这样一本传记，仿佛自己也随孟浩然一同走过了吴越的山山水水。那些化用在文中的诗句意境，那些被文字描摹的山水景致，都让我明白，真正的诗意，不在于远方的盛景，而在于内心的从容与对生活的热爱。孟浩然用一生告诉我们，纵使前路坎坷，只要心中有山水，眼中有诗意，便处处是田园。这或许就是曹远超先生撰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也是孟浩然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本版邮箱: yzwbmzps@163.com

